

一个饱含情感的故事。作者通过不断再现过去，保存记忆，对抗人终将被遗忘的命运。

动情的观察者

伤心人类学

〔美〕露丝·贝哈 著
韩成艳 向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Ruth Behar

動情的觀察者

電影人與電影

／ 陳曉文



动情的观察者 伤心人类学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美〕露丝·贝哈 著

韩成艳 向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4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情的观察者: 伤心人类学 / (美) 贝哈 (Behar, R.) 著; 韩成艳, 向星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1

(培文书系·社会科学译丛)

ISBN 978-7-301-21357-5

I. ①动… II. ①贝… ②韩… ③向… III. ①人类学—通俗读物 IV. ①Q9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6553号

©1996 by Ruth Behar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eacon Press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书 名: 动情的观察者: 伤心人类学

著作责任者: [美] 露丝·贝哈 著 韩成艳 向星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357-5/C·080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0.75印张 160千字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4.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ld@pup.pku.edu.cn

旅 人

我就像一个旅人，
到得港口无人候。
我是怕羞的旅人，
穿行在陌生人流，
看人拥抱和微笑，
可惜全都不为我，
我是寂寞的旅人，
独自竖起大衣领，
立在冰冷的码头。

——杜斯·罗伊纳斯^{*}

^{*} 杜斯·罗伊纳斯 (Dulce María Loynaz, 1902—1997)，古巴诗人，1992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著有《诗韵》、《不知名的诗篇》等。

致 谢

本书中的文章写于1987—1996年。这其间，不同领域的朋友和同事都在我的学习和写作过程中帮过我。我尤其感激 Ester Shapiro Rok 给予我的信念，她鼓励我相信这些文章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并用她自己思考和抒写悲伤的方式激励我。María de los Angeles Torres 一直帮助我对古巴保持坦诚的心态，在许多场合都耐心地听取我的报告。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从 Deborah Gordon 那里得到了一些最有见地的观点。Alan West 一直教我如何做一个好的诗人。若不是 Gelya Frank、Marianne Gullestad、Sandra Cisneros、Joanne Leonard、Susan Gelman、Bruce Mannheim 的智慧和支 持，就不会有《石膏里的女孩》这篇文章。这几年我一直很幸运地拥有 James Fernandez、José Limón、Renato Rosaldo、Victor Perera 这些良师给我的关怀。就在本书成书之前，Teofilo Ruiz、Scarlett Freund 给了我只有老朋友才会给的十分必要而中肯的评论。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那些允许我进入他们生活知道我要书写他们的人，我永远都无以回报。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得足够动情。

感谢那些一直给予我慷慨资助的机构：MacArthur Foundation、the 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the Lucius Littauer Foundation、the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cholars，以及最近给予资助的 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感谢密歇根大学的 International Institute、the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the Rackham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给我的奖励资助。本书写成于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古巴研究所，当时我是那里的一名洛克菲勒聘任研究员，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

还有我的丈夫 David Frye，我亲爱的儿子 Gabriel，谢谢他们的爱与耐心，谢谢他们在我夜里写到很晚时仍能睡得很香。尤其要感谢 Gabriel 用他宽广的心胸教给我许多东西。

Beacon 出版社负责本书出版的编辑 Deb Chasman，对本书应如何讲述故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最后我要把这本书真诚地献给他。

迈阿密海滩

1996 年 4 月

目 录

致 谢	5
第一章 动情的观察者	1
第二章 死亡与记忆： 从圣玛利亚到迈阿密海滩	31
第三章 我的墨西哥朋友玛塔	79
第四章 石膏里的女孩	93
第五章 去往古巴： 散居、回归与绝望的民族志书写	123
第六章 令人心碎的人类学	147

第一章

动情的观察者

通常涉及与人有关的书，不是实际型便是幻想型。我自己的书既不是两者的结合，也非与它们毫无关联，而是要探寻幻想中的客观性——离开这一点，任何现实的行为科学都不可能存在。

——George Devereux, *From Anxiety to Method*

1985年，哥伦比亚的一场雪崩来袭，一个村庄全部被埋入泥浆。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从电视上目睹了这场悲剧，看到大批的人被泥浆吞没，无助的她想要宣泄心中的悲痛。在她的短篇故事《塑造我们的泥土》（*Of Clay We Are Created*）中，阿连德写到了奥迈拉·桑切斯（Omaira Sanchez），一个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焦点的13岁小女孩。捕捉新闻的摄影者、记者、电视摄像者，这些在拯救女孩的生命过程中束手无策的人，纷纷在小女孩被困的泥浆旁俯下身，用他们好奇而无用的目光注视着她的痛苦。在这些同样身处恐惧的观察者中，自然也包括盯着荧屏上这场残酷“秀”的阿连德自己，在文章中，她着重描写了一个摄影者罗夫·卡乐（Rolf Carlé）。他也一直在观看，凝视，报道和拍照。突然，好像有什么东西咬到了他。再也无法忍受在相机背后默默地观看这一切，他开始拒绝站在一个无恶意的观察者的立场去记录悲剧。罗夫·卡乐扔下相机，蹲伏在泥浆上，用胳膊抱住奥迈拉·桑切斯，此时她的心肺都已衰竭。

作为一个好的动情的观察者的例子，罗夫·卡乐展示了一个目击者在灾难面前的两难困境。在大屠杀中，在折磨面前，在飓风刮来，在地震过后，或者也可说得更直接些，在记忆中隐约可见却又不会彻底消失的恐惧，在一个你身处寂静厨房的深夜里，全部向你袭来，就像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向一个聆听者敞开心扉，重数着她身上被划开的一道道伤痕，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会躲在相机的镜头后，会开着录音设备，会把笔握在手中吗？类似尊重、慈爱、怜悯这样的底线是否不能逾越，哪怕是为了留下记录？但是，

如果你不能停止恐惧，难道你不是至少应该记录下它吗？

阿连德觉得，一旦她写的故事被出版，奥迈拉便可能会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但在她为因患卟啉症而突然逝世的女儿所写的感人回忆录《宝拉》中，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奥迈拉的故事中，其中有一种神奇的幻象预示着未来将要发生的事。这一次，阿连德痛苦地处于悲剧的边缘，没有任何电视屏幕可以作为她的缓冲器。就像罗夫·卡乐一样，她必须同自己的女儿一道“陷在泥浆里”，女儿处于昏迷中，她的目光凝聚在“死亡升起的地平线上”。坐在宝拉这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睡美人身旁，阿连德，手里握着笔，放弃了幻想其他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屈服于棘手的现实，她觉得自己踏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隧道之旅，我望不到出口，但我知道它一定就在那里。我不能回头，只能继续往前走，一步一步，直到终点。”^[1]

对我来说，人类学也是一条类似的隧道之旅。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你去到异地，但却并不是仅仅到坐落在坎塔布连山脉有着坚实墙壁的房屋西班牙村庄去旅行，也不是到有无精打采的飞机盘旋其上的底特律的花园公寓去度假，或者是去一个有着破碎的粉红色圆柱和没有任何希望的港口城市哈瓦那，即使人们告诉我那里是我的出生地。失去，哀痛，对记忆的渴求，想要融入身边的世界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害怕受到周围的冷漠、白眼和不待见，对懦弱的气愤，那些总是挑衅之事发生后迟来的洞见，写任何东西都觉得毫无意义的无力感，突然燃起的写作欲望，这些都是路上不得不停留的地方。在旅程的最后，如果幸运的话，能够瞥到灯塔的一角，这时感激之情就会油然而生。说到底，生活还是很慷慨的。

[1] Isabel Allende, *Paul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5), 238, 310. Also see my review, "In the House of Spirits," in *Women's Review of Books* 13, 2 (November 1995): 8. Allende's story "Of Clay We Are Created" appears in *The Stories of Eva Luna* (New York: Macmillan, 1991).

但这肯定不是我们在大学学到的人类学，这听起来也不像是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素材。这也绝对不是能让你从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助学金的人类学。坦率地说，这也不是我通常告诉人们自己所从事的人类学。人们，比如说我的阿姨丽贝卡 (Rebeca)，有一次我们在熙熙攘攘的 Puerto Sagua 餐厅吃着古巴面包和西班牙欧蕾，周围的人也都吃得津津有味，似乎明天已被遗忘，巨大的盘子里放着棕色的洋葱和金黄的大蕉，她就问起我为什么会学人类学。

我为什么会学人类学？怎么说呢……那时我还很年轻……我想写作……有个老师对我很有信心……他们给我奖学金去学人类学……我就去了一个西班牙村庄……我在那里学会了如何背诵玫瑰经，听着我的西班牙系犹太人祖先在我耳边呢喃：“忏悔，忏悔……”这些年来人类学成了我经常离开、回来、打包、打开行李的一种方式，似乎我正在重复我们家族的历史，从欧洲到美洲，再到美国，再到 Puerto Sagua，不是岛上有着相同名字的 Puerto Sagua，不过这里的 Puerto Sagua 从来不缺古巴面包和牛奶蜂蜜咖啡……

我还没答完，她又开口问道：“露丝，告诉我，什么是人类学？”我还在迟疑着怎么回答时，她已自信地说道：“是关于人的研究，以及他们的习俗，对吗？”

是的。人们与他们的习俗。确实如此。不容否认。某种方式上也是人类学的遗产，即欧洲殖民者想要了解他者，以便于管理或提升他们，使得人类学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智识宝库。人类学的列表上（总是不断会有新东西添加进来）有着多种多样的研究：有关希腊人死亡悼词的研究，匈牙利和尼加拉瓜社会主义理想的命运，布鲁克林的海地伏都教，巴厘的艺术品市场，北达科他州西法戈女性中有关堕胎的争论，关于玛雅智者的读书讨论

组，印度教法师的预言，贝都因人式的幽默，美国原著民谈到白人时开的玩笑，罐头厂墨裔美籍女工的困境，沃尔特·迪斯尼世界的乌托邦，甚至我希望还能包括我们家刚从古巴到美国不久便在 Belt Parkway 发生车祸的故事（那晚在 Puerto Sagua 我们就曾聊到这事，丽贝卡阿姨告诉我，他们是第二天早上翻开周日的《时报》时，才吃惊地得知这一消息的）。

我给了我的丽贝卡阿姨一个稍稍有些夸张的答案：我觉得人类学是在 20 世纪末留下的一种最吸引人、最怪异、最纷乱，也是最有必要的见证形式。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学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一群特定的人形成特定关系的认识模式，人类学总是在为有关动情的问题而挣扎。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说：“你无法真正渗入另一种文化中，就像大男子主义者想象自己已经拥有的那样。你让自己按它的方式行事，它也有可能反过来牵绊住你。”^[2] 确实如此。那么你会让异文化绊住你多久呢？我们的学科使命就是这样一种深深的矛盾：既需要得到“本土人的观点”，又不能完全“本土化”。我们的方法论为一种矛盾修辞“参与观察”所定义，在根本上是分裂的：做一个参与者，但要有广阔的视野。在哥伦比亚的泥泞中，你可以用胳膊抱住奥迈拉·桑切斯。但是当补助金用完或者暑期结束，请你站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回到你的书桌旁，写下你看到和听到的。把它与你读过的马克思、韦伯、葛兰西或格尔茨相联系，你就走在做人类学研究的路上了。

没有比这种为了书写别的民族而观察他们更奇怪的方式了。《财富》(Fortune) 杂志派给詹姆斯·阿吉 (James Agee) 一项任务，让他把大萧条时期发生在美国南部那些贫穷农民身上能吸引眼球的故事带回来，他原本迫切地希望能用锄头开出一块新地，写成文字并出版。结果他写出了《让

[2] Clifford Geertz, *After the T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我们开始赞美名人》，这是一本他坦陈害怕自己可能利用了那些南部佃农的生活而写成的反思作品，这也形成了他的叙事的一部分，用一种有些夸张的分寸感和羞耻感，去描述那些有着相同生命的人。

德弗罗 30 年前就提出，像阿吉和阿连德这样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幻象的现实，是人们观察另一群人需要达到的目标。德弗罗是位民族精神病学家，他相信社会科学中的观察者并没有学会如何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情感融入他们搜集的材料中。德弗罗坚持认为：想要理解你真正观察到了什么，你就应该知道**观察者内部发生了什么**。他指出，观察者的主观性“影响了被观察事件的进程，就像‘检查’影响（干扰）了电子的性能一样”。观察者“从不会去观察那些他不在的时候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不会去听一个人对其他人重复叙述相同的事件”。由于没有清晰简单的路径去面对作为观察者的自己，大部分专业观察者都会探索出自己的保护措施，即“方法”，来“减少焦虑及让调查更有效地进行”。有时甚至会说“我是名人类学家，这就是田野工作”，这是使用该“方法”避开某些情境带给我们的焦虑的典型方式，在那些情境中，我们会感觉自己被权力结构给同化，或是无力帮助他人将其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或是因对到底该采取行动还是进行观察举棋不定而陷入迷茫。

虽然确认了所有社会知识的主观性本质，但对德弗罗来说，这种自我反省并非已经走到了尽头。意识到社会观察中存在的主观性，能够获得更重要的结果：获得客观性的必要形式，进而成为真实的“真”科学。^[3]抛开我们是否渴望本学科成为科学（至少我不渴望），即使接受德弗罗所说的“所有的社会观察都避免不了无处不在的主观性”这一前提，我们仍会遇到实际问题：你如何把主观性写入民族志后，继续把你正在做的东西叫做民

[3] George Devereux, *From Anxiety to Method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The Hague: Mouton, 1967), 6, 84.

族志？当民族志逐渐热得“太过个人化”，我们是否应该担心烟雾警报器会刺穿我们的耳膜？

在《作品与生活》中，格尔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民族志作者在陷入文本与抽离文本中不断地进行奇怪的转换，既非浪漫风格也非实验报告，而是介乎二者之间。不同于德弗罗，格尔茨主要考虑的问题，并不是把人类学重新归入一个更好的科学，而是民族志进程的后期阶段：书写的时刻及人们对人类学家文本的接受。格尔茨想知道人类学家（至少是一部分人类学家）如何把他们对其他人群和地方的观察转化为如此吸引人的修辞，以至于只有通过这个作者的文本，这些人群和地方才是可以想象的。就像格尔茨指出的，“一个重新研究阿赞德人的人，如果找不到埃文斯-普里查德声称他在那里发现的有关激情、智识和因果关系的复杂理论的话，我们可能更多会怀疑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他的——或是简单地论断阿赞德人已不复其本来面目。”

一个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对话和交流 / 互动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复制。即使用现在时将其写下来，它们也是独一无二，不能复原，发生之前便已消失，总是留在过去。民族志是人类学家旅程的唯一依据，这种事业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人类学家能承受格尔茨所说的“因写作身份而带来的压力”到什么程度。写作必须传递“密切接触遥远生活”后所得到的印象。

那么谁来决定这一目标已经达到呢？格尔茨说，归根到底，判定一个人类学家的作品比其他人类学家的更加真实的标准，其实带有强烈的“个人特殊偏好”（他坚持使用这个词，而不用“个人的”，实际上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有些晦涩不明）。例如，刘易斯（Oscar Lewis）基于自己在同一墨西哥小镇所做的研究，强有力地地质疑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对特波兹兰的生活描述的真实性，不过这并没有使雷德菲尔德的文本就此荒废。相反，通过把注意力直接转向对同一人群和地点截然相反的描述，刘易斯仅仅成功地证明了他与雷德菲尔德都是正确的，他们只是“因为摸到大象

的不同部位而产生不同的想法”^[4]。

格尔茨意识到了人类学家在其旅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其自身情感与智识，但在我看来，他就像德弗罗一样，似乎仍在半推半就地接受主观性的目标。德弗罗为了科学的缘故而拥护这种脆弱性。格尔茨则不断地向我们展示：被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里查德、马林诺夫斯基及本尼迪克特这些伟人所实践的人类学，毫无疑问带有个人特殊性，不过并非“个人色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严厉地批判了对“田野工作”进行自传体式的民族志书写。格尔茨坚持认为过多地内化“实际上是极其公开的活动”是不恰当的。

那么何种程度的公开的活动才是人类学家的工作呢？是的，我们去和人们交谈。有些人甚至很耐心、很友好、很慷慨地与我们交谈。我们努力好好聆听。我们写田野笔记，记下所有我们误解的事情，所有事后看来可能微不足道的东西，那些太多暴露于生活表面的东西。然后我们打包回家。接着开始我们的工作，我们最艰难的工作：回想民族志的经历，重新复活它，与远方交流，一切来得太快让人感觉就像有一个在我们所见所闻与最终无力公正地将其表述出来之间的深渊。除非寻找被遗忘的有启示性的时刻、没有表达出的渴望及悔恨的伤痕，否则我们的田野笔记就会变成羊皮纸，一无是处。即使我们选择以公开的活动开始，我们仍在自省中继续着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次朝向公众，如果第一次我们处理某些事情时危险地接近悲剧，那么第二次我们肯定会在滑稽剧的舞台上，因为田野主题的不确定性与依赖性被我们回到家后专家的位置所变更：我们站在台上，在希尔顿饭店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向一群承受着很大压力的民族志学者大声宣读我们的民族志文本时，吊灯在一根线上摇摇欲坠，空调的冷气则直刺我们的骨髓。格尔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缺乏一种语言来描述

[4] 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6.